

比亞著
湯澄波譯

英國社會主義史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M. Beer
湯澄波 著
譯

中山文庫
英國社會主義史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章

四〇〇六上

中山英國社會主義史一冊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 Beer

七二五

譯述者 湯澄波

編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譯者序

本書著者比亞（M. Beer）氏與其說是波蘭或奧國的，毋寧說是世界的一位社會鬥爭和社會思想的著名學者。他雖然生於波蘭，他的著述卻大部分以德英兩國文字發表，而且各重要國家都有譯本。其中最重要的，除本書外，尚有馬克斯的生平及教義，古代社會鬥爭，中世社會鬥爭，社會鬥爭與社會主義先驅者，社會鬥爭與社會思想，社會鬥爭與近代社會主義等。

最初把他的著作介紹入我國的是胡展堂先生，他於一九二七年根據日譯本，把上列的最後兩種重譯為產業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史及馬克斯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史（民智書局出版）。一九二九年冬我會再把由古代社會鬥爭起這五本一貫的鉅著介紹給葉啓芳先生請他譯成中文。葉氏的譯文一九三〇年後，已在社會鬥爭通史的總書名下次第譯就分卷出版了（神州國光社）。

我遂譯本書的動機發生於一九二六年，當我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準備講授「社會主義」那一種課程的時候。可惜還未動手，便離校了。一九三一年秋，我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教席講授「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也就再想下筆。但因那年冬間匆匆離粵赴京，也就再度擱置。直至去年年底，和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鍾天心先生談起編譯計畫，提及此書，乃下最後決心，簽訂繙譯的合約。

我自從大學一年起，即開始譯書，迄今已有十四五年的經驗。所譯書籍不下十數種，字數亦達百萬以上。然而那些書籍泰半都不是自己選擇的，而且迫於學費或鹽米之催，下筆異常倉卒。事後重讀，類多自認為要不得。這一本是十年來所屢想逐譯而又是業餘的成績，要算是比較滿意的了。但正因為是業餘的譯品，繙釋的時間，除星期日上午外，全在下了辦公廳，晚飯前後——五時半至七時，八時半至十時半，力倦神疲，又恐錯誤在所不免。雖然依照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規定，譯文曾經一度的負責校閱（我以為想獲得忠實而良好的譯本，另由別人校閱的制度很是重要，名人大可不請，負責卻屬必需），如有錯誤，我仍舊是不能辭咎的。我只盼望讀者不吝分別指正，俾本書於再版時——假如有此機會的話——能變成欠缺較少而稍減譯者辜負原著人一翻心血的內疚。

本書原著為英文，第一卷初版於一九一九年，第二卷一九二〇年，譯文所據的是一九二九年出版（G. Bell and Sons）的改訂和補充。至於牠的價值，塔尼先生在導言中已有詳明的介紹，用不着我再說了。

本書由中山文化教育館給譯者以得價索願的機緣，是譯者所特別感激的，並附誌於此。

本書原稿係由英國倫敦大學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湯澄波識於天津。

本書譯者亞（A. Ross）以其其籍是英國倫敦大學畢業生，並曾留學中國，故其譯文極其精確，且其譯文極其精確，且其譯文極其精確。

精審

作者自序

十三世紀起到今日止，社會主義和社會改革的潮流，大抵是以不列顛的思想和經驗為來源的。不列顛羣島的中世紀的煩瑣學者和政治家，近代的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詩人和慈善家都曾從事過這種工作並且光大過這種潮流，只留待別國的作家予以稱述而已。不列顛尤其是英倫的哲學和科學上的成就，也有同樣的情形。吉卜甯先生(Mr. Kipling)的英雄的『探險者』(Explorer)就是她的真確象徵了。

『我很知道誰將居功——就是一般跟着走的聰明少年——十數人一同到來——絕不知道我種種岑寂的恐慌；

追蹤而至住宿於我所遺棄的營幕——使用我所掘鑿的泉井。

他們將會回去發表談話。他們將被稱為「開路先鋒」。

這是自古所已然，但現在卻不應再復如此了。不列顛的學子應得努力工作和善用英倫的開路思想家所會供獻於世界的各種見解。英國需要已往為社會主義和社會改革而費去的勞力所獲得的一切知識，經過整理而系統化的知識，求能解決各種社會困難和日見明顯的混亂狀態。

英國人的頭腦，從其絕對放蕩性而言，根本是革命的，大抵比法蘭西人的頭腦為尤甚。但自一六八八年以後，

英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卻力求與國人以一種保守、穩重的氣質，使之不信任綜合的推理，厭惡把理論推演出其種種必然的結論。他們利用這些方法似乎成功了把國人之智力上的敏捷性和進取性都壓抑住和固定住，而產生種種顧慮周詳的思想。在平時，這技巧的手段確有很好的成績——正如勒斯力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所說，「不邏輯性救了我們」，並且使英國人享有為妥善的意識和清醒的判斷所支配的令譽。可是在擾亂普遍發生的時代，當各種社會的動力猛然擡頭之際，英國人卻往往把他們內心的抑制撤置不顧而奮居革命思想和行動的領導地位。我們今日所處的就是這種時代了。

自新世紀之始，新的英倫便已漸次出現——「像睡醒的健兒般掙扎起來，擺動着其所向無敵的髮辮」；她的男女都一齊起來了，他們的精神對於教義和道德的刺激已變成易於感受而敏於感應了——英國的國民正在前進着。全國的知識份子像在過去嚴重關鍵中一樣的勇猛和活動。舊的爭論不是已被遺忘，便是已被強迫而作最後的解決，民衆們正在聯合各階級共同應付重行分配財富和權力的問題。一種新的「工權憲章運動」（Chartism）又已擡頭而且日趨進展了。

現在表現於社會考察者的眼前的時代表示出好些和一八二五至一八五〇年極相類似的特色。生產和分配的力量之因「工業革命」而集中，當時新興中層階級之努力爭取政權，力求實現新商業政策的搖動；自「組合法」（Combination Laws 一八一四——五年）廢止後勞動階級之擡頭，各種全國職工聯合會之組成，中層階級和勞動階級間之同盟反抗「保皇黨」（Tory）的貴族而贊成「第一次改革案」（First Reform Bill）

八三〇——三二二年，勞工之醒覺和後來革命職工組合主義或「工團主義」(Syndicalism) 一八三三——四年之勃興，「工權憲章運動」或「社會勞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 一八三六——四八年之發展；最後，「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少年英倫」(Young England)和「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之興起——這一切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偉大精神騷動，現在都似乎在更大規模和更緊張的重演之中。然而，「第一次改革案」的鬭爭對於當時的新興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所發生的影響，我們懂得多少？自一九〇九年以後「憲法」鬭爭對於有組織的勞工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又懂得多少？或許說，革命的職工組合主義之跟着一八三二年「改革案」運動而出現，及「工團主義」和總罷工之又跟着爲魯意特佐治先生(Mr. Lloyd George)的「財政法案」(Finance Bill)所引起的「憲法」危機而發生，是否光是一種偶同的事件？「勞工」之隨着一八三五年的革命職工組合主義之崩潰而加強其政治行動，會不會爲今日的「工團主義」和不列顛勞動黨(British Labour Party)所重演？「關稅改革」(Tariff Reform)是否必能結束今日的社會騷亂，正如「自由貿易」(Free Trade)之勝利結束了「工權憲章運動」一樣呢？

這些和許多其他重大的問題都在兩個時候的比較研究中呈露出來。我不敢說已供獻出這些問題的適當解答，我的目的在鼓勵社會和政治的學子而不在給他們以萬應靈藥。我不過在不列顛的神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勞工」報章，和一般的定期刊物的偉大寶庫中，把有關本題的材料盡量採摘出來。我會根據各種材料所隱含的理論和一般概念加以分類，又指出多種形態和領袖人物的歷史背景，以使各種材料和

當時的各種社會事件和思想的發展成了連絡。

由一七九〇年到一八四〇年，「法蘭西斯普里士的搜集和原稿」(Francis Place Collections and Mss)不是藏在不列顛博物院原稿部 (British Museum Manuscript Department)，就是藏在痕頓博物院 (Repository at Hendon) 中的材料，對於我有極大的幫助。我乘這機會對不列顛博物院的圖書館員和助手表示我的謝意，因為他們對我的請求曾予以很客氣的優遇而對我工作又給以許多便利。

羅伯奧文 (Robert Owen) 的通信，現在還保存於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合作薈售社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中。可否由我向主管人員提議把牠移交不列顛博物院的董事會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以嘉惠一般學子呢？

我在寫這書時，時常感到缺乏關於英國煩瑣派學者的英文著述的痛苦。很奇怪，英國的神學者關於嘿爾茲亞歷山大 (Alexander of Hales) 或鄧司各脫斯 (Duns Scotus) 或奧坎威廉 (William of Ockham) 並沒有一人曾做過一本淹博的專著。難道因為這些主要法蘭西斯派和煩瑣派學者之第一個死在巴黎，第二個死於科倫 (Cologne)，第三個死於慕尼克 (Munich) 而被他們視為外國人麼？

我所同樣引為憾事的是，關於從一七七四年到一八一九年的嚴重時期的幣制論戰，尤其是紙幣問題，並不見有英文的著述。

這本英國社會主義史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只是我想償還我對於英國生活和英國學問所

積欠的鉅額的思想上的債務的一種卑微的嘗試。要不是因為會旅居此地凡二十年，我實在寫不出這本書來，這二十年的旅居教我知道，一個民族必要先達到很高級的政治和精神文明程度，纔能進行社會之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希望研究英國社會的學子以他們的批判，匡我之不逮，使本書再版時可以減少其錯誤。

這書是根據我曾受英、德、奧、匈和俄國出版界歡迎的德文本英國社會主義史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England*, 1911年版)而作的。英文本事實上是新作，曾經全部改訂，並為大量的原著材料所補充。

末了，恩索爾先生 (Mr. R. C. K. Ensor) 曾校讀過我的原稿而且有所改正，我很感謝他，沙德衛爾博士 (Dr. A. Shadwell) 當我寫這書時曾給我以鼓舞和勸告，也是我所感激的。

比亞 (M. Beer)

修正版附註

上邊的序言作於一九一四年六月，正當英國社會主義史的原稿快將完成之際。然而，因「大戰」發生，出版的日期卻展延到宣告和平，社會再復注意國內事件之後。本版的内容，除了少許的例外，全是出現於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原著的一種忠實的重印。在第二卷中，論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的第十九二十兩章曾經過若干修訂，因為牠們似有改正或補充之需要。其次，本版又因為添加述及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八年的一章（第二十二章）而擴張了篇幅。這一章也是根據原版所已取得英國出版界和一般社會的一致贊許的冷靜精神而作成

的。

于我很高興趁着這個機會向彌得爾敦先生 (J. S. Middleton) 勞工黨的助理秘書和息特林先生 (Walter M. Citrine) 職工組合大會的秘書長，表示感激之忱，因為他們會把種種實情告訴我並且分別把各屆勞工黨會議和職工組合大會的報告書借給我應用。黎芝的馬替孫先生 (Alfred Mathison) 會把他關於約翰法蘭西斯布累的生平的特有記錄寄給我，其盛情也是我所樂於誌謝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 比亞。

于亞 (Mr. Beer)

Dr. W. G. S. (1928) 當...

本工想...

...

...

...

...

...

...

導言

是書現在以英國社會主義史卷一之名出版，依作者之本旨原爲兩卷中之第一卷，其第二卷將述及「英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直到現世紀第一年代爲止。第二卷之付印，因「世界大戰」而延擱，比亞先生，像其他的許多學子一樣，一時被迫丟開了他的文字工作。因此，第一卷乃於現在單獨印行；第二卷則希望在恢復和平時可以問世。合並起來，這兩卷書將會成爲英國社會主義思想之發展的最完全的記載。本卷的主題是社會主義之發達，直至「工權憲章運動」之擡頭爲止，而讀者必須記着，這種敘述是完成於續卷中的。不過本卷所述及的時代卻儘够明顯而足供單獨研討之用，而這書又是一貫的，而不是零續斷簡的作品。

比亞先生這本書是一種對於資本主義農業和資本主義工業之勃興所產生的諸問題的政治思想，在首先經過這種轉變而其經驗又最完備的國家中的發展程序的研究。牠之稱爲英國社會主義史，是因爲牠所注重的特殊思想形態是謀以較能與社會團結和經濟自由和容的組織原則代替但求個人利益的動機來指揮工業的努力，這種努力一部份是批評的，一部份是建設的，同時是希望，理論，預言，又是行動綱領。像其他概括繁複的政治勢力的名詞一樣，「社會主義」的涵義有種種之不同，不只迭代相差，而是十週遞變；比亞先生聰敏地力避創趾適履，以免造成任何整齊的界說。他讓他的標題的意義由不同的和有時相反的混雜思潮中，依照牠們天然的複雜

性，豐富性，和不整齊性在他的書裏顯露出來；而並不先規定社會主義的正統教義然後依照其相近程序之大小以類別種種不同的教義解釋者。他的作品不是某一宗派或某一政黨的紀錄，而是一種道德和智識運動的分析。

本卷將會指出，這種運動確有種種堪稱經典的著述。這種運動的發展與歷代作家的文獻的遞嬗並沒有多大關係而大抵由於每代對於其目前的各種主要事實和理論所具有的日新月異而自然流露的反想所使然。

「工業革命」前夕中英倫的思想環境，「法蘭西革命」和長期「戰爭」所引起的反響，前此的騷動，其後的覺悟，第一次的「改革案」，亞當斯密（Adam Smith）里加圖（Ricardo）和「功利主義者」的影響，均為時代背景，非先加以說明，萌芽時期中的「英國社會主義」是無法可以使人了解的。比亞先生依照牠們所應得的敘述，把牠們逐一說明。他在當時的政治思想中所舉出的要素，不像博物院中的標本而實帶有牠們所藉以打動苦惱的時代的思想的浩蕩的能力和廣博性。一個經濟時代的關鍵在乎經濟，正如一個宗教時期的關鍵之為宗教一樣。他所獻給我們的，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利弊問題的大爭辯之一方面的研究，這種爭辯，十九世紀在其自信力登峯造極之時，雖可以漠視，但不能制止，而直到現在還未結束。他常常立足於穩固地位，而他又不是把歷史化為一串抽象名詞的人。但本書的主題是政治思想，而不是政治事實，而且他對於製造和磨礪各種理論的工廠又比對於理論的實際應用較為注意。如果有批評家認為紀錄意見的史乘是一種無謂的淺嘗，那就讓他們讀了本卷之第二篇以後再考慮他們的判斷罷。因為牠所從事追溯其發展和產生的意見不是古董奇蹟，卻是一種爆炸極強的火藥——而且是一種還未着火火藥。

這些意見具有深長的歷史，而本卷第一篇所述說的就是由中世紀起到十八世紀開始止英國思想中的各種共產主義原素。正如柏拉圖之「基督教」一樣，工業時代前之「自然的合羣精神」(animae naturaliter Socialisticae)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比喻的名稱，我們斷不能因比亞先生的論述而說他視精神上的關係為直接關係。從他看來，初期思想家的重要性全在他們所傳下的政治原理的遺產。正如他所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出現於一個智力上已有接受的準備的國家中。牠之發展並不是由機械發明之偶然的連續所使然而是由於前人之聚精會神於某些問題所致，而從某一方面說，洛克(Locke)和布拉克斯吞(Blackstone)之為其真正先鋒正與阿克來(Arkwright)和克倫普吞(Crompton)無殊。所以，本書之第一篇實是本書的主題——「工業革命」的重大變革之下的政治思想之發展——的一種導言。

由一七六〇年到一八四〇年的社會史在英國所引起的注意比任何其他時期都較厲害。圖卑(Toynbee)赫爾特(Held)堪寧干(Cunningham)和孟都斯(Mantoux)已使牠的大概情形為一般人所熟習，而罕德先生夫人(Mr. and Mrs. Hammond)的傑作，更繪出新經濟制度對於鄉村和城鎮的工人之意義的一幅不能忘記的圖畫。已告成功的政治哲學會為勒斯力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一種精細研究的主题。當牠還在為着牠的存在而奮鬥之時，窩雷斯(Wallas)教授即已把牠敘述過，迭西(Dicey)教授曾指出，牠在極盛時代中曾怎樣的於一八三二年和一八七〇年間改造了英國的思想和制度。從未經過切當論述的就是曾歸失敗的政治哲學的歷史。因為新工業制度的頌讚者獲得了十足的勝利因而使其他批評家全被遺忘，而一般人也

就以爲「功利主義」是至理名言。那似乎就是當時的稱道者的情形，就是現在也往往如此。見於當日社會者一方面爲不肯思考的蒙昧主義；一方面則爲不能思考的困苦的盲動。但在資本主義工業成立的那個世紀的最初四十年中，智識份子都異口同聲的讚揚這種工業，而使代替的哲學無從出現於英國，直到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纔由海外輸入。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印象，但本卷卻指出牠是一種錯覺。十九世紀初期的政治意見的衝突中的主角不是兩個而是三個，而最少人知道的那一個並不是生氣最少的一個。因爲資本主義一旦佔了優勢就產生牠的批評者了，另一種理論體系已隨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及邊沁的政治學說出現而開始攻擊新制度的基礎了。所以，往往有人說，資本主義工業之古典的根據地，在德國逃亡者未在英國博物院中發掘堆積的藍皮書以前向無社會主義之說，這是不對的。馬克斯自己也很知道，英國的土產社會主義，除了法蘭西所給予一切創設思想的鼓舞之外，並沒有接受過異族的影響。斯盆斯（Spence），奧格爾維（Ogilvie）和佩因（Paine）已故的布拉文先生（Mr. P.A. Brown）在所著英國歷史中之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中所說的幾位人物，都是農村改革者，雖然佩因的工作並不以此爲限。葛德文（Godwin）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查理士荷蘭（Charles Hall）與其說是社會主義者，毋寧說是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批評家。但格雷（Gray），湯卜遜（Thompson），荷治琴（Hodgskin）和布累（Bray）的著作，除布累的係出版於一八三九年以外，均在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間出版，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未發表之前二十餘年，早已定下社會主義思想

的主要路線了。他們的著作差不多都已遺失。除了福克思維爾教授 (Prof. Foxwell) 爲安頓·孟革 (Anton Menger) 的勞工對全部生產的權利 (The 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 一書而作的導言以外，他們的著作再沒有切當的英文解說了。而且，本書的讀者又可以發現，他們並不是怪僻的人物，而實是勞動階級所藉以在一八二〇——一八四〇年間取得其所最需要的東西——即是一種解釋他們之所以墮落的原因的哲學，和一種能够把他們的痛苦、熱情和希望化爲力量的清晰理論——的思潮的代表。

本書大部分的篇幅所敘述的正是這種思潮，牠的來歷、關係和支派，牠在工業界和政治界中的種種理論上的發展和實際上的結果。牠的直接影響很是深重。「社會主義」一詞首被採用於一八二七年十一月之合作雜誌 (Cooperative Magazine)，牠把那些以爲資本不應私有而應公有的人們稱爲「公有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Communions or Socialists)。牠的意義不是集產主義，而是合作；而所謂合作又不是狹義的合作，合作後來所採取的指導營業的特殊方式，而實是廣義的合作，即以友愛而不以競爭爲基礎的社會制度。一八四四年的洛芝得爾墾荒者 (Rochdale Pioneers) 在提倡「整理生產、分配、教育和政府的各種力量，或者換句話說，建設一個以共同利益爲根據的自給的國內殖民區」之時，所指的是還是這種意義的合作。

合作在未成爲一種經濟策略以前，原爲一種社會原則的體系，如果我們說，牠的實際應用諸多仰賴於羅伯·奧文 (Robert Owen)，則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在理智上苦心作成這種信念的是初期的英國社會主義者。他們與「工權憲章運動」和「職工組合主義」的關係也是同等的重要。對於前者他們助之以反資本主義的成見，

新近過世的豪厄爾 (Howell) 的鉅著曾指出，這種成見實是使英國北部的紛亂工人附從於拉味德 (Lovett) 和倫敦工人聯合會 (Londo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所揭櫫的切當政綱的實際動機。他們的教義早已藉賴工人階級的各種報章而變成通俗，職工組合主義之所以採取一種革命的和挑戰的形式，而撤置一七六〇至一七八〇年間的沉着防衛的聯合會以至十八世紀的各種地方職工俱樂部，種種目的於不顧，一部分是由於這種教義的影響所使然。不是由勞力獲得的財產原是贓物，生產者和非生產者之間必有階級戰爭，經濟勢力應先於政治勢力，得救之道不在國會，而在有組織的工人們的工團主義運動——這一切都是一八三〇——四〇年間進展程度已深的職工組合主義的標語。『就我們說，普選權將開始於我們的分會中，逐漸擴張到總組合，終於吞併了政權；』『社會自由必須先於政治自由。當我們處於政治奴役狀態之中的時候，我們行使自由權利適足以替我們的暴主謀利益，適足以使我們服從利用我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的黨派罷了。』(1) 在這些見解的激刺之下，職工組合主義變成一種以打破現存經濟制度為目的的努力，而不是志在改良該制度之下工資所有者的境遇。職工組合的歷史，像職工組合法一樣，向為過嚴的定義所困，我們實應參照上述的見解重加訂正。誠能如此，則我們將可以發見，我們現在所覺得新奇的，或曇花一現的各種運動其實是基本的永久的趨勢之重現罷了。比亞先生在他的自序中說：『英國人的頭腦，從其絕對放蕩性而言，根本是革命的……在擾亂普遍發生的時代，當各種社會的動力猛然擡頭之際，英國人卻往往把他們內心的抑制搬置不顧而奮居革命思想和行動的領導地位。我們今日所處的就是這種時代了。』他這幾句說話對於現時比之下筆的時候更為切當。『社會